

团旗设计者周令钊

·王聪聪 梅潇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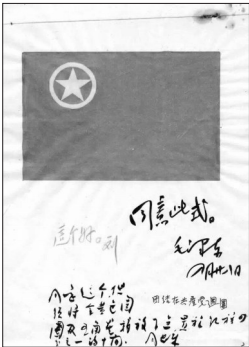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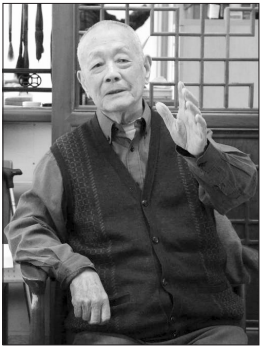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制定团旗,设计者周令钊(见左图)立足“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一定位,以简单、鲜明的设计表达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组织,青年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以旗帜凝聚青年,指引青年,形成了鲜明的精神路标。

设计灵感

您设计团旗的灵感来自哪里?

周令钊:我从“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这条文字中感悟到,团旗设计应有两个视觉形象主体,其一是五角星,象征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其二是一个圆圈,我将圆圈放在五角星外围,这条封闭的圆线,从平面构成这一视觉传达设计基础分析是由无数点组成,象征着团结在党周围的无数先进青年。简洁明了的主体形象有了,我马上又画了一张色彩效果草图,30分钟后团旗设计一气呵成。

62年后的2012年,共青团纪念日前几天,我意外地见到了我设计的团旗草图复印件,并得知了设计稿交稿后的下文。我的设计方案和各地选送的上百件方案精选十数件一并送交中央领导审阅定夺。在我的方案草图上,毛泽东主席写了“同意此式”,刘少奇主席写了“这个好”,周恩来总理写“同意这个”并具体指出“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移放下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见右图)。不久后我设计的团旗飘



扬在五四运动及共青团纪念日活动

坚定信仰

您经历了连年战乱、颠沛辗转,但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您在什么时候确立了信仰并坚定信仰?

周令钊:我出生于1919年5月2日,两天后“五四运动”爆发。我还是少年时就进入了社会,并一直做着艺术服务社会、宣传大众的工作,随着人生经历的积淀,也逐渐坚定了信仰。

1931年我12周岁,小学毕业。当时社会时局动荡,家中经济每况愈下,我打算跳过初中考入高中程度的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长沙青年会补习英文、在正德学校补习中学古汉语。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回长沙中学附小跟汪仲琼先生学用美术字写抗日标语,学画抗日宣传画,四处张贴;参加小学生宣传队,到长途汽车站讲演、散发传单,宣传抗战。记

得当时年龄还小,对国家大事、社会政治还缺乏理解和分析能力,所以讲演稿是当时已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今天的共青团)的母亲郑家一帮助完善的。

青年时期,连年战乱,难以持续在课堂学画,走更多的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路。1937年我18岁,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轰炸上海,我在长沙参加抗敌画会,和朋友们每星期赶出一个画展,到街头乡镇巡回展出,宣传抗日;19岁在武汉三厅美术科,参加黄鹤楼《全民抗战》大壁画的创作绘制;随抗敌演剧第五队经桂林、柳州、贵阳、大理、保山、西双版纳到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一路宣传抗日。路上大山起伏、民族村寨、服装银饰,看不尽画不完。那段生活,对我日后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1942年我23岁,到柳州参加了抗敌演剧第五队。抗敌演

剧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于1938年由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亲自组织建立的,是在国统区的特殊战斗环境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革命文艺队伍。

在五队,我为在柳州、桂林、滇西、楚雄等地上演的反法西斯七场话剧《人兽之间》、曹禺的《丁大夫》(又名《蜕变》)等作舞台美术与演出海报设计。

《人兽之间》话剧中,我设计的布景景片都是借用队员们的灰色军毯绷成的。在效果厚重的灰色军毯上挂一幅窗帘意指民居、换一块铁栅栏指敌监牢等,军毯景片靠灯光变色营造出契合剧情的氛围。这个舞台布景的设计,被许多行家赞誉为:融写实主义与构成主义于一炉,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主义风格,是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创举。23岁的我获得行家们如此高的评价,着实欢喜,更坚定了自己前行的信心。

致信总书记

2018年夏,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您与其他七位老教授致信总书记,表达了将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总书记在回信中特别提到您。您认为要如何通过美育教育筑牢青年

的信仰之基?

周令钊:信仰之基不是一蹴而就,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都不容忽视,坚持贡献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理念需要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作为支撑。人文艺术可以启迪心智,使人日益开明,扬大我而弃小我,美育正是筑牢信仰之基的重要途径。

近百年来,我见识了祖国的山河壮美。面对如此美好的河山,我认为青年们不论早晚,也不论是否从事人文艺术专业,只要认识到美育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性,认识到人文艺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主动关注并接受美育的普及教育,便有望筑牢信仰之基。

什么是您想要的人生,实现了吗?

周令钊:我14岁开始接触实用美术;18岁起做公共艺术宣传抗战;29岁为迎接解放做木刻传单画稿,为国共北平和谈设计会场等;30岁起为新中国的成立画过开国大典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其后又参与并主创了政协会徽、国徽、团旗、队旗、钞票、邮票等一系列国家形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美术的要求多种多样,我感到美术家能胜任就是幸福。这些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工作,我一直做到百岁,因为这是我一生的追求。80多年间,我也游历过祖国众多山川,所到之处,写生收集资料,画创作草图,之后空闲了就搞些自由创作。回想我的百年人生,丰富、充实也踏实。

(摘自4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深大设计师罗征启

·宋春丹·

4月12日,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去世。或许“北清华,南深大”的创校梦想早已远去,先天禀承先锋气质的深大也逐渐归于现实,但罗征启等改革拓荒者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不会消失的。

筹建深圳大学

1983年春节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得知消息,要调他去深圳筹建深圳大学。不久,他参加了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召集的协调会议。黄辛白说,中央已批准建立深圳大学,请清华、北大和人大支持,现第一批调清华副校长张维任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人大经济学教授方生任副校长抓教学。

1983年8月底,张维、罗征启和方生等应邀来到深圳,第一次踏上南头区粤海门村的新校址。眼前是一座荒凉的小秃山,1700棵荔枝树因长期无人照料已衰败枯萎,罗征启却看到了“一日千里”的一股劲头。他说:“一平方公里、一片荒地、一张白纸,我感到这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

经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批准,拨给深圳大学基建费一个亿、设备费一个亿。罗征启全权负责学校的规划建设。

罗征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规划的首要因素应该是“人”,但在现实中,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和仪器设备。图书馆的书库大,阅览室却小,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抢占座位。长期以来所讲的“先生产、后生活”,实质上被歪曲为先“物”后“人”了。明确了这一点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

图书馆是规划中的全校中心,处于最高的坡地上,体量最大。图书馆从早上8点半开到晚上12点,全年365天开放,全部开架。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每500名在校生要配备一所食堂,按深大当时四五千学生的规模,至少需要八所食堂。但深大食堂每天开12个小时,这样三所食堂就够了。

学生宿舍设计成两人一间。罗征启认为,这表面看起来浪费,其实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就减小了。不算地价,图书馆造价是一平方米1000元,学生宿舍是110元,因此宿舍做成两人间

是最经济的做法。

罗征启认为,大学是智能荟萃的地方,因此学校环境必须格调高雅,富于文化氛围。

新旧混战勇者胜

罗征启说,深圳不是没有旧东西,有些比内地还严重,但它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各种旧事物也是初来乍到,不像内地结成了网,连个缝隙都难找到,而在这里你总可以找到空当,新旧混战勇者胜。

勤工俭学是他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深大率先在全国取消了学生助学金,改为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制。一支勤工俭学的学生队伍取代了庞大的职工队伍,并逐渐从清洁、服务等渗透到学校的各个部门。改革最兴盛时,深大凡和学生有关的工作岗位,全由学生担任。罗征启要求,学校管理人员只能配备学生秘书,报告只能自己写。

罗征启说,深大不可能在教学质量上很快追上老牌名校,但是可以提高竞争力。如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的质量并不如美国、西德的产品,但



罗征启(中)与深大首届毕业生合影

是竞争力强,因为它适销对路,性价比高,包装和广告好。深大要在竞争力方面争取一流,才能在全国高校中立起来。

1986年5月,罗征启接替张维担任校长,继续兼任党委书记。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作为校长,学术地位、成就和威望以及在教学科研上都是有欠缺的,既需要支持,也需要监督。同时,学术和行政工作不同,不能采取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因此建立了教授会,主持学术活动。原来深大由学术委员会负责职称评定,论资排辈严重,教授会成立后,一些年轻、业务强的讲师得以晋升。

深大学生独树一帜

报考深圳大学的学生年

年增长,1987年报考人数是录取人数的200倍。

深大学生和社会的贴合度在高校中独树一帜。学生骨干毕业时都很受用人单位欢迎,绝大多数日后在事业上都很成功。罗征启的早期措施在深大造就了大批学生企业家,深圳名企蓬勃发展,很多创业者都毕业于深大。1985级财务会的周海江后来成为红豆集团CEO,1985级电子技术与计算机专业的梁光伟成为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88级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史玉柱成为巨人公司董事长,1989级计算机专业的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许晨晔,1989级应用化学专业校友陈一丹一起,创立了腾讯公司。

80年代末,罗征启离开深圳大学。夫妇俩创办了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清华苑与深大仅一街之隔,罗征启暇时常到深大散步。

罗征启曾写过一段回忆文字:当年点亮的青春火炬,依然在我的心中燃烧。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美丽的日子,是永远不会黯淡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6期)